

我的藏学研究之路

○黄明信（1938 历史）口述

黄明信，1917 年 12 月 29 日生于湖北沔阳，193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20 世纪 40 年代任华西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长住拉卜楞寺从事研究藏传佛教文化 8 年，考得然监巴 rabjamba 格西学位，于藏传佛教、尤其是因明学方面有深厚的功底。50 年代初期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谈判过程中在首席代表李维汉身边做翻译，后来发表过《追忆十七条协议翻译工作二三事》一文。2017 年 5 月 29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100 岁。

1953 年起在民族出版社任藏文编译室副主任。是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藏文翻译组的主持人之一，并主持过《格西曲扎藏文词典》和一些民族遗产的整理出版工作。传统的藏文里佛学词汇丰富而现代词汇贫乏，建国初，翻译宪法、毛泽东著作遇到困难，黄明信参加了开创时期的工作，对藏文哲学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确定做出了贡献。

曾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干事、西藏天文历算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民族文字研究会名誉会员。1992 年国务院为了表彰黄先生为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发给证书和特殊津贴。

问：黄先生，在咱们图书馆您是资深研究馆员，藏学界您是贡献卓著、德高望



黄明信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在一起

重的专家，现在已经 95 岁高龄，希望您谈谈您毕生从事此项事业的经过和成就以及对后人的期望。是不是可以请您先简单谈谈您的家庭。

答：我的家庭与图书馆是非常有缘的，我的大舅祖父卢木斋先生曾经以十万大洋独资捐献给南开大学一座木斋图书馆，我的三姑父冯文潜曾兼任其馆长，可惜 1937 年毁于日本炮火。据《卢乐山口述历史》第 14 页载“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里还藏有他的遗稿和手筒各一册”。我的三

□ 口述历史

叔黄钰生从南开大学被谪贬到天津图书馆任馆长，后因贡献卓著被推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退休后仍任名誉馆长。我的表弟冯承柏曾兼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可以说我的家庭与图书馆是非常有缘的。我的父亲黄立猷著有《石刻名汇》《金石书目》，至今仍是图书馆金石部门的重要参考资料。木斋图书馆的照片《卢乐山历史》第8页上有。《石刻名汇》本馆金石组有。电脑上有样张，台湾有影印版。

问：您是怎样走上藏学研究之路的？

答：从事藏学研究，1937年前在北平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南迁。1938年学校又从长沙迁往云南，迁移的途经有三条，我选择了最困难的徒步行走，经过湘西、贵州的崎岖山路前往那一条。途中经过苗、瑶、侗等民族地区，才大开眼界，亲眼看到原来我们国家还有这样的地区和同胞。许多同学沿途采集岩石、植物标本，民俗民歌等，乃至窗棂的图案。到了云南之后掀起了研究边疆民族的热潮。我却想，这里人才荟萃，而新疆、西藏地域更加辽阔，人才更加稀少，我到那里更容易作出成绩，出人头地。但是一时找不到前去的途径。凑巧听到经费雄厚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在中国发展文化教育，有建立肃州、天水、湟川三个中学的设想。我想湟川中学在青海，那里与新疆、西藏都毗邻，到了那里寻找机会更容易些。我的三叔也赞成，该董事会的副董事长李书华是我父亲的学生，由他辗转托人才得到一个湟川中学教员的职务，我到职之后还有人问我，这里是北大人的天下，你怎么挤进来的？

到了青海之后知道去新疆、西藏暂时都不可能。因为，新疆的盛世才叛变，把毛泽民等汉族革命者都抓起来了；西藏政府欢迎班禅回去，但是拒绝国民政府所派的卫队和一切汉人进入，原来住在拉萨的国民政府办事处也被驱逐出境了。我只能留在青海。同时又知道了藏文藏语的重要，不但藏族本身，蒙古、土族、纳西等族也信仰藏传佛教，读藏文经，写藏文字。湟川中学的学生必修藏文课，于是我就下决心业余学藏文。一年之后我感觉仅仅业余而不是专修，是很难学好的。因此下决心攒一些钱离职去学。藏族的文化中心是寺庙，必须住到一个寺庙的附近。青海最著名的寺庙是宗喀巴故乡的塔尔寺，为什么我没有去塔尔寺而去了甘肃夏河的拉卜楞寺呢？

我在湟川中学作教员时的同屋王树民曾经参加顾颉刚领导的西北考察团，到过拉卜楞寺，知道那里的文风之盛超过塔尔寺（入寺之后进一步知道经常有二三百蒙古喇嘛在这里学习，其中甚至有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喇嘛三四十人），而且有一个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安宅、于式玉夫妇已经在那里。还有一个拿中英庚款补助的人张逢吉在那里，我如果自费去到那里，一年之内总能申请到庚款补助继续研究。就拿着自己积蓄的三百元到那里去了。

问：既然您去拉卜楞寺不是为了信仰，为什么还入寺、出家呢？

答：第一，李安宅的研究毕竟是从寺外，再深入必须从寺内。第二，经济，中英庚款的收入主要来自粤汉铁路的投资，战争时期，收入锐减，研究补助费停止，

我的计划落空，就此撤退，于心不甘。当地就业，不能专心学习、研究。入寺后的收入，还勉强能维持生活，继续学业，于是受戒出家，进入寺院。

问：进入寺院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答：1943年我写过《拉卜楞寺喇嘛生活》一文，2007年出版的我的《藏学论文集》里有，容易得到，可以取阅。需要补充的是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我入寺当喇嘛的全套服装是一个还俗的人交换得来的，没有钱买新的，靴子破了张着嘴，师傅看见了可怜我，把他的旧靴送给我，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喇嘛的上身由于气候寒冷比印度多一个背心，下身三层或两层裙子，没有裤子，小便时不是站着而是蹲着。其实这也没有

什么奇怪，汉族人穿裤子也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有的。其前交战是站在用马拉的车上，手执长矛刺杀对方，远远不如胡人（北方的民族）骑在马背上转动灵活。战争失利，不得不放弃马拉车的方式，但是宽袍大袖，穿裙子、光屁股骑马很不方便，不得不仿效胡人上身穿窄袖衣服，下身放弃裙子，改穿裤子以便骑马战斗。

饮食方面，每家院里都有一口井，自己汲用。比较讲究的人饮食水不用井水而用河里的活水。日常的饮食里酥油糌粑，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丰富而缺少青菜VC，因而导致牙龈出血、牙根动摇，我曾长期居住在那里，以致四十几岁就把牙齿全部拔掉，改用总义齿；当地的人可能是经过天演淘汰，留存者都能适应这种环境。



2008年1月，国家图书馆举行恭贺黄明信先生九十华诞暨《黄明信藏学文集》出版座谈会。鲜花后左为任继愈、右为黄明信

□ 口述历史

住的方面，本寺没有集体僧舍，都是个人私有的，一般是一至三个居室，活佛府邸和同乡会有较大的院房，有马棚，供施主来居住。寄居旁人的房屋的人，有义务汲井水、扫院子、下雪时及时上屋顶扫除，捶打裂缝，以防融化后渗漏。僧舍只能用土平顶，不允许用砖瓦顶。我初入寺时住在卓尼同乡会的马棚旁边一间小屋里，终年不见阳光。后来借到一间面向西南的房屋就觉得很幸福了。经济宽裕之后买了一个一居室的房屋。

两个法会期之间的自修期间，低年级的学僧夜间要在屋顶来回走动温习功课，以免困倦。冬天有风时，飕进没有裤子的裙子里，其难受可想而知。

上殿进入经堂一般僧众须要脱靴赤足，饮用茶水时，由低年级的到茶房用小木桶取来分给高年级的，取茶者数十人在经堂门口排队等候放行，地面凹凸不平，又湿又滑，冬天赤足站在那里，是很难受的。

问：您在拉卜楞寺8年之久，取得了然监巴，那是一个比博士更高的学位吧？

答：藏传佛教的学位与现代欧美的学位属于完全不同的体系，不好相比。现在中国的学生到国外经过5年可以取得博士学位，是在大学毕业已经有学士学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深造而得到的，8年时间绰绰有余。我在藏传佛教寺院的学习等于是在没有任何基础上从头学起，显宗的五部大论学完须要16年，完成者叫做“噶仁巴”，可以转入密宗院学习3年，取得“俄仁巴”（密宗士）学位。也可以不转入，终身留在显宗院，待位数十年后取得“多仁巴”（石坪士）学位，前后共三十余年。“然监巴”

并非最高学位，中观部高级生就有资格被推荐，每年冬夏各四人，数目不少，并非十分难得。不过得到推荐者须要回答16位多仁巴的问难，也不是很轻松的。可是没有通过通不过的问题。至于名次没有正式的宣布，只是在全体大会上做亮相性质的对辩时，被指定辩论的问题最难的那个人就是第一名。学位的有无、高低、取得的时间早晚都关系不大。不像硕士、博士的学位与其职位的高低息息相关。

问：您取得学位之后就离开了吧？

答：二者关系不大，我是形势所迫。寺主嘉木样的哥哥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弟弟拉卜楞寺大香佐二人打算把嘉木样架空，由他们掌握实权。嘉木样不甘心做傀儡，积极培养他自己的青年骨干，设立一个50人的学习班，专教书法、写信、记账，准备派往直属寺院、部落去，听他指挥。他本人请我教他汉文汉语，以师礼相待，由教育部建立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他本人担任校长，我任教导主任。从五个扎仓各抽调10名青年喇嘛做学生。在大殿里给我很高的座位。旧势力不服，敢怒而不敢言。一年后我代表他去南京“述职”，完成任务后我回北平探亲。在此期间嘉木样突然去世，旧势力抬头，我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只好离开那里回到北平。

问：回到北平之后，您在中央民委和民族出版社做了哪些工作？

答：回到北平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作什么事，好在手里还有些钱，就闲空了一段时间，后来南开大学邀我去讲西藏史。院系调整，我感觉自己马列主义一

窍不通，申请去革大学习，学习一年交代清楚历史之后，分配到中央民委参事室做翻译。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谈判时我在李维汉身边工作，事后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证明协议确实充分考虑了西藏方面的意见，有积极的影响，2003年出版的《见证百年西藏》上又重载。1953年成立民族出版社，我任藏文室副主任；其他蒙、维、哈、朝各室的主任都是本民族人，而我不是，因此只能是副职。1954至1956年，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藏文翻译组有六个地区、单位来的人，各出一人做副组长，正组长平旺是人大代表，很忙，实际由我负责的，也只能是副职。

民族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版重要的政策文件。传统的藏文里佛学词汇很丰富，而现代词汇贫乏，建国初翻译政策文件、毛泽东著作遇到困难，我参加了开创时期的工作，对藏文里哲学、社会科学名词术语译法的确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我还主持过藏汉双解的《格西曲扎藏文词典》和一些民族遗产的整理、出版工作，包括《五体清文鉴》的影印出版，对此书的成书过程进行了考证，此文在四十余年之后2003年出版的《贤哲新宴》里又被重刊。

1958年起在农场劳动20年，1979年平反。这20年我是公安部管辖下的“强劳”，名义上仍是公民，有选举权，实际没有自由，藏文业务完全荒废，对家庭也是政治累赘。

问：您何时、怎样离开农场？

答：1978年，我被从山西长治的农场借调到成都参加《藏汉大辞典》的编辑工作。其中藏历方面条目释文的汉文翻译遇到困

难，为此，我学习藏历，有些收获。1979年平反后调到北京图书馆。

问：您在北京图书馆民族组贡献卓著，被引为我馆的骄傲，请具体谈谈您的贡献。

答：北京图书馆民族语文图书组是于道泉先生一手建立的。其中藏文古籍一千多包是他费很多心思、抓住机会搜集来的，但是他在这里只是兼职，未能做更细的工作。我来到北京之后，他认为继承人，把我推荐给图书馆，这时我的年龄已经六十出头，一般单位不会录用这样年龄的新人，但是北京图书馆还是录用了我。我接手的只是一个收书登记簿，没有正式的图书馆要求的书名、作者、分类的卡片，不便检索。汉文书的书名、作者，封面、首页上都有，照录就可以了。藏文书是长条的，著作的本名前常有不少附加成分，必须从中抉择出其本名，如果照录其封面上的全文，则读者很难查找。作者的名称在后记里，也需要编目者自己抉择。其他问题还有很多。我把自己的经验总结起来用汉藏两种文字写成《馆藏藏文古籍编目条例》详细说明，发表在《中国藏学》创刊号上，成为各处图书馆编制藏文古籍目录的重要参考资料。

问：除藏文古籍编目之外您还做了哪些工作？

答：1986年任继愈先生邀我给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隋唐卷》写吐蕃佛教部分，我参考柳诒徵和邓之诚的方式，史料选读加解释、分析，写了近20万字。该书因故未及时出版，此稿亦因而搁置，20年后，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我的藏学文集拟收入

□ 口述历史

此稿，20年来藏学研究发展很快，我年老鲁钝，未能及时修改补充，不过自认为其中顿渐之诤、译经事业两章尚有特色，同意收入，2010年又出单行本。

我去青海塔尔寺把那里所有的经版都印刷了一部，共二百余包，丰富了馆藏。

佛教典籍有南传北传两支，北传主要有汉文、藏文两支。二者大都直接从梵文译出而有所不同，究竟有哪些同、哪些不同，成为众所关心的大问题。元朝初年皇帝集中几个民族的学者对勘，这是一项大工程，编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书，历来学者们对此书的功绩均有很高的评价。我利用馆藏的汉、藏、日文资料逐条查对，发现原书所记“蕃本同”“蕃本缺”并不完全准确，原书记为“同”而在今本大藏经中未查到者约三分之一，记为“缺”而查得不缺者有四分之一，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写出《至元录笺证》一书。

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是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汉文里有“人名词典”可查，藏文里以前没有这种辞书。“教历”[bstan-rtse]里有这种资料，但不便检查。我与谢淑婧合作编写了《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按人名的字母顺序排列，其有异说者给出出处，还照顾到一名多人和一人多名的情况，读者使用方便。当然藏族历史人物不止这些，尚有待补充。

《笺证》《手册》两书得到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2010年本人又得到其荣誉奖。奖状上有国徽，是国家级的。

问：藏学界里您对天文历算的研究享有盛名，您在拉卜楞寺时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吗？

答：西藏的学者按照印度的传统把知识学问归纳为大五明小五明。天文历算是小五明之一。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先把内明和因明学通，然后再学其他各“明”。如果先学了其他“明处”，再学内明，就很难进入。我在拉卜楞强调完全按照传统学制进行，40年代离开时五部大论尚未学完，历算尚未学过。我学藏历是70年代末，参加《藏汉大词典》的编辑。这个词典是藏汉双解、小百科性质，其中当然应该有藏历方面的词条。一般搞藏历的人大多只会按照公式演算，不深究其原理，不能写好。而这位作者曾经深究其原理，所以写得很好，一定会给本词典增色。可惜没有人能把它准确地翻译成汉文。以前陈尊妫先生写《中国天文学史》时，为了藏历曾经亲自去到拉萨，找到历算研究所的所长，但是翻译人员不懂专业，无法沟通，空手而归。现在这里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想，我的藏语好，当年数学基础也好，应该能够解决，就毅然承担下来。

我在藏历专家的指导下，按照藏历所给的公式和数据做了推算月食、日食的例题，和五星位置的推算，拿推算所得的结果与紫金山天文台公布的结果核对，误差不大，说明我对原书的理解是正确的。又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陈久金先生请到成都来，拿推算的记录给他看，他仔细看了之后指出被斥为迷信的罗侯星的科学意义；用来决定闰日、空日的“太阴日”虽然现代科学里未讲，但确有科学意义，因此，闰日空日的设置也不是迷信。藏族的历算家们长期以来因被斥为迷信不知如何反驳而困扰的问题得到解决，所以对我们特别感激。藏医院院长绛

巴赤列要求我在论文的“恭请者”名字里写上医算院，标志藏族学界对我的贡献的肯定，是我最引为骄傲的一件事。

我写过《对于几种辞书里“藏历”条释文的评论》一文，对于端正人们对“藏历”的理解很有帮助，载《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黄明信藏学文集》328~343页。

藏历在藏学里只是一个较小的分支，也不是我开始从事藏学研究时认定的部门。我在藏学里学习时间最长的是因明，不过也未学透。正当我学习到因明学的最后一

年，受到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事情的干扰没有学好，而且我没有逻辑学的基础。本来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是有机会跟金岳霖学逻辑的，我却贪图虚名选了微积分。后来在因明学方面我能拿出来的只有“口头辩论规矩”“藏传因明学书目”这些外围性的东西，拿不出来深入一些的东西，简单地说，我的学问是夹生的。

（国家图书馆王建海采访，2012年11月13日）

水利系三门峡办学基地纪实

○陈宝瑜口述 钱锡康 孙哲 冯茵整理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在校外有几个办学点，水利系三门峡办学基地是其中之一。

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1969年初，校系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全面开始，大批师生外出开门办学。水利系工军宣队负责人传达周总理指示：黄河三门峡工程要改建，如不改建，要出大问题。请清华大学水利系派一个小分队到三门峡去参加工程改建设计。

1960年在黄河河南段三门峡建设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坝高100米，水库和水电站设计发电能力为100万千瓦。三门峡水利工程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由水利部十一工程局（以下称三门峡工程局）承担施工建造的。苏联专家脱离中国的实际，完全不了解黄河存在严重的泥沙问题，在列宁格勒按照河流是清水状态设计的。运行几

年后，就出现水库及上游河床泥沙淤堵，一直堵到上游潼关，河床提高，库容减小。黄万里先生当时坚决反对建三门峡工程，就是针对泥沙问题的。实践证明，黄万里教授的意见是正确的。

水利系决定派陈宝瑜同志来负责这项工作。[注：陈宝瑜，1963年1月毕业于



2017年4月20日陈宝瑜接受采访